



用自己的角度来记录上海

1292年，元朝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，批准设立上海县。690年后的1982年，26岁的雍和从崇明的前进农场回到上海，在陪女友逛虹口公园的时候偶然间拍到一张年轻人击鼓传花的照片，取名《偏偏轮到我》。想不到，这幅记录年轻人参加基层团组织活动的照片，被《中国青年报》等多家报刊发表，也让雍和对纪实摄影产生了兴趣。

可以说，《偏偏轮到我》成了雍和打开摄影之门的敲门砖。“很庆幸，我无意中记录的一个生活片段，成了解读一段历史的注释，从此，我也开始了有意识地记录。我发现，只要用镜头对准生活，总会有好照片的。”

1983年春，雍和借调至闸北区体委搞摄影。两年后，他进入《中国城市导报》工作，正式成为一名摄影记者。也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，他把镜头对准了上海，拍摄最多的内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发展，摄影题材涵盖车展、楼市、股票市场、司法案件、商业活动、文化娱乐、浦东开发、交通建设、城市改造、中外交流等各方面的社会民生形态。

1992年，雍和又去了《青年报》工作。因为很多照片的选题是他自己找的，并不是给文字报道配图，所以他干脆在《青年报·生活周刊》开了一个摄影栏目，用他的观察来解读自己拍摄的照片。

在雍和看来，摄影记者开专栏，这看上去很传统，其实也很新锐。“有些人可能形式很新锐，但是观念并不尖锐，应该批评的不敢批评，只能玩弄一些技巧，看似创新，其实老套甚至腐朽。真正的新锐，应该和这座城市的脉络紧密相连。”在雍和看来，这就是一种“上海精神”——敢于批评和突破。

1998年，正在创刊的《新民周刊》主动找到了雍和。“在《青年报》时，很多时候是围着新闻转，《新民周刊》往往没有及时的新闻概念，要靠自己去发现和积累，自己要建立个图片库。到了《新民周刊》，因为有《青年报》的经验积累，我懂得新闻应该怎么去拍，怎么去抓。我往往会以新闻的眼光去观察事件，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新闻。”

在《新民周刊》，雍和和《文汇报》过来的资深记者陆幸生共同开设了“两人影话”专栏，雍和负责拍照和说明，而陆幸生则有自己的解读。摄影出身的雍和在这个专栏越写越多，从一两百字到后来五六百字，而陆幸生每次大概千把字，和雍

和的解读可能殊途同归，也可能南辕北辙。这样的形式在2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依旧很有新意。

2003年，雍和又转到《新民晚报》工作，并开设了“雍和快门快语”这一名专栏。很多读者甚至就是为了看雍和的这个专栏才去订报的。

在雍和看来，相机是他关注上海这个城市的眼睛和窗口。相片是会说话的，体现着摄影师的发现、记录、观点和感悟。“人性的东西，千百年不变，关于人的生、死、爱的价值观，无论技术手段如何改变，这些核心内容不变。”

在“分寸感”中不断创新

2022年是上海建城730周年。雍和深深感受到了另一种“上海精神”——在“分寸感”中不断创新。在他看来，突然冒出来的“团长”就是“上海精神”的典型——遇到困难，抱团取暖，互相帮助。

在外人看来，上海邻里平时似乎很“冷”，但关键时刻这种“温暖”就被激发出来了。在雍和居住的小区微信群，有邻居说“缺香烟、咖啡”，他就把多余的香烟和咖啡放在楼内公共的桌子上让大家“按需自取”。“我不会去问谁拿了，对方也不会问谁放的，大家平时交往有分寸有边界，但关键时刻这一边界就会模糊。”退休以后的雍和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拍照，但他现在却拍得少了。

一方面，有了感兴趣的话题才拍，不会拿着相机漫无目的地去“扫街”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大家对于隐私保护的加强，面对“长枪短炮”的相机或多或少有一种“被侵犯的感觉”而有所提防。为此，雍和也会用手机拍照作为一种妥协，虽然手机成像仍然比不上专业相机。

他现在花更多的时间在整理照片上。“20年前、10年前拍的照片，不整理就在沉睡，需要重新激活。”雍和举例说，2020年杭州杀妻案的凶手许国利，就曾出现在雍和2004年拍摄的照片中。当时，上海南汇区康桥镇怡农村鸭棚暴发禽流感，雍和去拍摄当地养鸭户、浙江诸暨人许生伟。同是诸暨老乡的许国利当时也在南汇下沙养鸭子，疫情解禁当日，他赶来关心，被雍和拍了下来。16年后，雍和的这几张照片引爆了社交媒体。

雍和感叹：“原来觉得是好的照片，如今看来没什么价值。反而一些随手拍的，如今看来很有意义。”